



铭记历史 珍爱和平

本报寻访两位重庆大轰炸幸存者，讲述那段苦难的历史

为纪念抗日战争期间在“重庆大轰炸”中不幸遇难的同胞，激发全市人民爱国热情，增强国防战备意识，根据《重庆市人民防空条例》有关规定，6月5日上午8时20分至8时32分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试鸣放。

84年前的今天，是重庆大轰炸中最惨烈的较场口隧道惨案发生的日子。在重庆大轰炸纪念日来临之际，本报寻访了两位经历那场浩劫的幸存者。他们的记忆

片段，是对侵略者暴行最直接的控诉。然而，比苦难更震撼人心的，是重庆这座英雄之城在烈火与废墟中淬炼出的不朽精神——坚韧、忠勇。

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。我们铭记历史，从苦难中汲取捍卫和平、开创未来的磅礴力量。英雄之城的光辉，将永远照亮英勇前行的道路。

重庆大轰炸幸存者陈桂芳，现年93岁

“下雨般的炸弹，夺走了我的双亲”

■新重庆-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周尤

6月4日清晨，嘉陵江上泛着微光。93岁的陈桂芳，枯瘦的手紧握手窗沿，目光投向窗外一处地方。“这里以前是一片废墟，现在成了孩子们玩耍的地方。”老人的脸上洋溢着欣慰的笑容，“这就是和平的模样，多美啊。”

但陈桂芳仍然害怕一种声音——作为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也是幸存者，即便过去了80多年，她还是非常害怕飞机的轰鸣声，“这声音，如利刃刺穿心脏。”

最悲惨的一天

父母被炸死，小桂芳成了孤儿

“那天也是这样的热。”陈桂芳喃喃回忆道，眼里泛起泪光。被岁月尘封的惨痛经历，仍留在陈桂芳的记忆深处。

“炸弹的爆炸声就是催命符，是幸福生活的休止符！”陈桂芳原本有个幸福的家，一家三口住在江北陈家馆田家院。父亲在外工作，有固定收入。母亲照顾孩子、料理家务。只有一个女儿，父母视她为掌上明珠。一家人的生活，安宁、幸福。

但这一切，在1938年戛然而止。这一年，日军对重庆主城区及周边地区开始狂轰滥炸。

“每天都提心吊胆，时时都会听到警报声，人们一听到警报声就跑到家门外，漫山遍野找藏身之处。每次轰炸后，遍地都是被炸毁了的房屋和尸体。”虽然当时只有6岁，但这黑暗的一幕还是深深刻进了陈桂芳的脑海中。

1939年5月3日，是改变陈桂芳命运的一天。

那一天，重庆闷热得如同蒸笼。下午2点，小桂芳和父母正在家里休息。

“呜呜……”突然，刺耳的防空警报声响了起来。来不及多想，父母拉着惊慌失措的小桂芳向外跑。满街都是找藏身之处的人群，人人都像没头苍蝇，乱跑乱窜。

“慌乱中，我和母亲与父亲跑散了。母亲带着我，找不到很好的藏身处。但飞机已经快飞到我们的上空，情急之下，我们只找到了一个‘生基洞’（俗称生坟）躲避，自己瑟瑟发抖蜷缩在母亲的怀里。”陈桂芳回忆道。

很快，飞机飞临上空，先是三架五架，后来是一排两排，一次比一次多，像下雨般丢炸弹。爆炸声不断传来，房屋瞬间火光冲天，到处都是惊叫声、痛哭声。

突然，一阵巨大的爆炸声在陈桂芳耳边响起，她只觉得头上、手上一阵剧痛，接着就看见鲜血从头上、手上不断流出。母亲抱着她的手也一下子松开了，倒在地上，血肉模糊。旁边，和陈桂芳一起藏身的邻居双手从手掌处齐齐整整被炸断，血不停地流，人躺在地上痛苦地叫喊着。

“我一下子扑在母亲身上，用没受伤的手拉她，但她已经毫无反应了。”陈桂芳陷入悲伤的回忆中。她说，当时四周一片悲惨叫声，母亲叫孩子的，孩子叫妈妈的，丈夫叫妻子的，妻子叫丈夫的……声声悲惨。

轰炸后，陈桂芳和母亲被送到医院，母亲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，父亲也被炸死在街上。陈桂芳虽捡回一条命，但右手残疾，大脑留下弹片，并伴有严重的后遗症。从此，陈桂芳成了孤儿。

废墟上的重生

邻居们帮她活下来，并送她学纺纱

“父母去世后，医院让我把他们安葬了。但我一个娃娃哪里得行，我只有求曾经和爸爸相熟的叔叔，给他们磕头，求他们帮我安葬双亲。”想起当时的无助，陈桂芳再也说不下去，一行泪从通红的眼睛里滑落。

右手。记者周尤拍摄。陈桂芳展示被日军炸伤的



安葬了双亲。一个7岁的孤儿怎么活下去呢？

“我当时满身是伤，又饿又痛，天天都在地上躺着。有大人看我实在可怜，给我砍了几棵树，做成床。”陈桂芳说，那时自己一天哭到黑，除了哭不知道还能怎么办，“我甚至想，怎么没把我一起炸死算了，死了就好了。”

眼睛痛的毛病，就是那时落下的。战争夺走了陈桂芳的双亲，却没有夺走这座城的精神。重庆，在废墟之上炊烟复起。

东家给一碗饭、西家给一碗水，陈桂芳活下来了。11岁时，好心的邻居刘苏珍（音）带着她来到当时的裕华纱厂学习纺纱。厂里管饭不发财，但至少解决了温饱问题。

几年后，陈桂芳又来到猫儿石一家纱厂工作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她有了养活自己的能力。

“太奶奶”的心声

记住现在的好日子，比什么都强

“我的母亲用生命的代价，让我活下来。活下来，好好活。”如今，四世同堂的陈桂芳也可以较为平静地说起那段经历。

陈桂芳的重孙上了小学，扎着羊角辫，喜欢依偎在太奶奶膝头听故事。当孩子稚嫩的小手抚摸老人手臂上那道早已褪色的浅淡疤痕时，陈桂芳总会把她搂得更紧些。

“太奶奶，还疼吗？”孩子仰起头问。“早不疼了。”老人摇摇头，“记住现在的好日子，比什么都强。”

几天前，陈桂芳在家人陪伴下，再次来到重庆大轰炸惨案遗址悼念。遗址内，昏黄的灯光照着冰冷的石壁。陈桂芳倚着腰，抚摸着石壁，嘴里说着什么。

从72岁开始，每年的重庆大轰炸纪念日，陈桂芳都不曾缺席。

尽管年事已高，陈桂芳依然坚持参加各种纪念活动。不仅在纪念日当天，平时她也受邀走进学校、社区，向年轻人讲述重庆大轰炸的历史——“我要让孩子们知道，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。”

遗址外，阳光明媚。一群系着红领巾的小学生手捧白菊，排队进入遗址。陈桂芳静静地看着他们，又抬头望向湛蓝如洗的天空——那里曾经是死神呼啸的通道，如今只有洁白的鸽群掠过。

重庆大轰炸幸存者朱道祥，现年94岁

“连串的爆炸声，带走了我的家”

都能看见，既是给大家预警，又能够加加油、鼓鼓劲。

那阵爆炸声告诉我——家没有了

1939年4月的一天，朱家人的命运被彻底改变了。

这个日子，朱道祥永远也忘不了——“那天上午，突然响起空袭警报，母亲便让父亲把家人带回家，我们躲在竹制吊楼的下方，一家人蜷缩在一起，等着飞机飞走。”

当时，朱家人周围，到处响起炸弹不断落下和爆炸的声音。突然间，一阵巨大的爆炸声在朱道祥耳边轰然炸响，“到处都是烟，我只知道要跑、赶紧跑！”说到这里，朱道祥的声音颤抖起来，“我冲出烟雾，看到周围有人。他们叫我，喊我看袖子，我低头一看，手臂上插着两块黑乎乎的东西，袖子上全是血，然后我眼前一黑昏过去了。”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朱道祥终于醒来，看到母亲躺在自己身边，到处都是伤者，还有人在拖尸体。“当时我弟弟还很小，被当场炸死，父亲和姐姐重伤，而母亲手指被炸断，我的左臂受伤，只有哥哥和妹妹侥幸没有受伤。”

由于家里已无力抚养全部孩子，朱道祥的哥哥只得忍痛送走妹妹，之后便把朱道祥和母亲送到医院。

“我的手臂在手术后取出弹片，至今留下两处很明显的伤痕。”朱道祥伸出手来，手臂上两处下凹的印记呈黑色，格外明显。

更令他伤心的是，母亲本就有一伤在身，加之悲伤过度，一周后就离开了人世。

“弟弟被炸死，妹妹一去再也没见，母亲伤病而死，原来幸福的七口之家，最后只剩下父亲、哥哥、姐姐和我。”说到这里，朱道祥咬紧牙关，声音也颤抖起来。

那场战争教会我——要热爱和平

出院后的朱道祥和大自己两岁的姐姐，得到居住于羊坝滩的姑妈的帮助，另起炉灶。朱道祥由于年纪小，经常随父亲参与交通船工作，那段时间里，看岸上，残垣断壁；转过头，满船尸首……

“我们过着艰苦的生活。抗战胜利后，我的侄儿出生，取名朱得胜。1950年父亲去世，我便到武汉电力局当工程师，哥哥和姐姐继续留在重庆，哥哥去兵工厂当了学徒，姐姐在重庆安了家。”

回顾这段历史，朱道祥沧桑的嗓音中愤懑难平：“日本对重庆发动的大轰炸，给我的一生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和身体痛苦。日本政府，必须承认侵略行为，承担侵略责任，对我们受害者所造成的精神损失和经济损失作出赔偿。”

为此，他多次参与相关社会、学术活动，也曾多次来到重庆参观大轰炸遗址，讲述自己的故事，提醒大家勿忘国耻。

吃过战争的苦，朱道祥也更能理解今天的好日子，更能体会祖国的强大——“我是经历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的。现在，我经常看电视上有关战争的新闻。看看他们，就如我们的昨日重现，对比如今蓬勃发展的新中国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认识到，没有强大的祖国，就没有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。”

如今，朱道祥仍在参与各类有关抗战的宣讲纪念活动，幼儿园、大学、社区成了他新的“工作”场所。“我想告诉所有人，要热爱和平、反对战争，任何情况下都应尽力避免战争，因为战争没有赢家。”朱道祥说。

朱道祥讲述那段苦难历史。记者何庆渝拍摄。重庆



■新重庆-重庆日报记者 卞立成

94岁的朱道祥现居住在武汉，前几天来到重庆。

5月28日，重庆大轰炸“六五”大隧道惨案遗址。“我的耳边仿佛呼啸着日军飞机引擎声”，朱道祥沿着长长的楼梯向下慢慢走，眼里泛起泪光，用力咬紧牙关，抓紧扶手稳住自己颤抖的双腿。

尽管已经过去80多年了，但作为重庆大轰炸的幸存者，朱道祥永远也忘不了那刻骨铭心的引擎声与爆炸声，“一个好好的七口之家，因为日军轰炸，被炸成了四口之家。”

那些轰鸣声告诉我——没有安全

“我出生在上海，1938年一家人逃到重庆。”朱道祥回忆说，“那时我还小，上海究竟经历了什么，并不是很清楚，只知道日本鬼子要来害我们。跟着父母亲走，他们去哪儿我就去哪儿，一定能到个安全的地方。”

就这样，朱道祥与父母亲、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一起，一家七口人坐着交通船，沿着长江一路逆流而上，慢慢来到重庆。

朱道祥至今记得，刚到重庆时，看到这座有山有水、还没有被战争波及的城市，一家人都松了口气，“父母带着我们在当时的东升门住了下来。”没有战争、没有侵略者，一家人渐渐安下心来，更加确信这里是安全的。

然而，随着战事越来越紧，日军把战线越推越近。日军飞机的频繁出现，彻底打破了一家人的幻想，“我能看到那些飞机，三架排成一个品字形向我们飞来。多的时候，一次能看到二十多架，飞机的引擎嗡嗡响个不停。”

飞机飞过，紧随轰鸣声的就是一连串的爆炸声，地动山摇，房屋倒塌，惨叫声、哭喊声、呻吟声不断。“大轰炸的时候，我大概七八岁，当时敌机走了，（我）真是忍无可忍。”

随着日军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，重庆城里，人们渐渐多了一个“习惯”——在山头上用竹竿连着个黑色或者红色的小球，要是有日军飞机来轰炸，就把小球高高挂起。因为警报来得慢，重庆城里山多，要是挂起一个球，大家

史料 重庆大轰炸

●据《重庆防空志》记载，为达成“以炸迫降”的战略目标，1938年2月18日至1943年8月23日，日军对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，史称“重庆大轰炸”。

●1941年6月5日晚，日机对重庆进行了长达5个多小时的轰炸，市中区（现渝中区）十八梯、石灰市和演武厅（现磁器街）三段防空隧道内，发生了震惊中外的避难民众窒息、践踏惨案，数千民众伤亡。这就是骇人听闻的“六五”大隧道惨案。

●据《重庆市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名录》统计，重庆主城区及周边区县承受了日机近万架次、18000多枚炸弹的轰炸，直接伤亡32000多人，房屋毁损17000多幢。

